

#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六十五期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编者的话：**神化历史，古已有之。历代统治者伪托神迹，以示其受命于天；党史研究的神话叙述，则是为了宣示一贯正确，并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这是专制制度的政治意志使然。

正如本文所言，长征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的神性基础。有外国人把它比做《圣经》中的《出埃及记》。

不过，自称持唯物史观的史学“研究”并不伪托神迹，其代用品是“历史规律性”、“历史必然性”之类意识形态的说辞，其叙事则与神话同构：正如摩西遵循神意带领犹太人历尽险阻到达约许之地迦南，毛泽东顺应历史必然性带领红军排除万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按本文的描述，“从革命到逃亡”，主题的转换，就是从理想主义回到生存本能，从进攻性的“全国革命战略”转向被动的逃生，一路上东奔西突撞到了陕北。

在后来的重述中，这一过程变成了预先设计的“北上抗日”，其间的每一次败绩都是“错误路线”所致，每一次脱险都是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而终点则正是出发前的目标。这种“打哪儿指哪儿”的写法是为了表明：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救星，因其一贯正确而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若是宗教文本可不必还原为历史，但以历史名义构建的神话则难免受到质疑。

去年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集会、报告、演讲伴以展览、影像、歌舞，煞是热闹，却仍旧不脱神话框架。其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岂能还抱着蒙昧时代的幽灵不放？过时的破绽

百出的神话不再能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真正的合法性要靠实行民主宪政来获得。

两位“局外人”别开生面的对谈与其说还原了史实，不如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回归常识。所谓常识，就是不能违背和超越历史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要以常人的心态面对历史，而不必计较“理论框架”，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不是根据理论，而是根据对当下情况的判断。趋利避害，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据此，我们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神话及其改头换面的变种所迷惑。在人为的信息障碍和资料匮乏的环境中，这也许是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最不坏的方式了。

本篇对话是热心朋友提供的网文片断，作者不详，未经授权，引用者请核对原文。

## 关于长征的对谈录

Y：中共革命史，对人们一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不论中外都是如此，就是它奇迹般的胜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从一般的常识上似乎难以理解，那么一个出于绝对劣势、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的政党，是如何取得胜利的。于是，诉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或其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一些意识形态、历史规律、民心向背或某种理论范式的说法似乎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诉诸那些我们完全不能准确把握的东西，也就没有可能使我们从中得到知识，让我们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教条而已。反过来，这种诉诸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的思考习惯，也使得我们更加偏离常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坊间大量充斥的民间秘史，从一些未经证实的历史细节去比附这段历史，从而以对某些人物的神化的方式，去理解这段历史，不论是正面的赞美还是负面的贬斥，都是如此。再有一类，就是中共本身编撰的历史了，它可以说是把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似乎相当完美的历史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有一个难以逾越的

巨大困难，就是必须经常不断的去修改，以适应现时的政治状况。这样，它自身就不断瓦解自身，使它的解释完全不能让人信服。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种其他的方法，使我们可以靠近这段历史，或者说，使我们在常识上可以理解这段历史呢？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C：是啊，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两个海外学者，黄仁宇和黄宗智，就是从第一种角度去进行工作的。他们都试图发现或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从更深的更远的角度去理解的某种命定的东西。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的不论是褒还是贬的秘史，都是从一种神化当事人的角度去演义这段历史，演义到离奇可笑的程度，充满了阴谋论的气味。但是，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发现细节上的错误，这些细节上的错误，就使得人们对这些解释将信将疑，这个将信将疑的源头，还是基于人们的常识感，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Y：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常识的角度去进行解释，才有可能使之可以理解。我们的“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其实不外如此。这段历史，是发生在我们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的故事，都是生活世界的故事，当然在常识上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个世界里获得解释，不论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或愿景。这是没有办法的。

C：我们要做的，就是试图回到生活场景，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势，去分析判断。当然，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缺乏，这个资料的缺乏，是绝对的。大量资料的解密或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缺乏，不能结束这个缺乏。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更多的想象与猜测，唯有如此，才使我们可能靠近历史，有可能信度更高地还原那个历史场景。从而，试图发现中共神奇的力量之所在。

Y：无论如何，长征正是中共这个政治组织神性的基础，涉及到这个组织形成的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这方面也值得细细说道说道。长征中有几件事可以谈，一是长征之起始，一是湘江之战，一是遵义会议，一是张国焘，一是东征，一是西路军。这几件事在长征途中属于标志性的重大事件。

C：长征的起因，就是因为军事和经济的情势所迫。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不是长征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开始叫西征，就是同二、六军团会师，再创新天地。那么，一个十万大军的大转移，特别是还包括一个政府的大转移，对中共来讲，的确是第一次。肯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些问题还为以后提供了经验，就当时来讲，做得不错。可以这样说，长征是一连串的事件；一个越来越被动的过程；一段见招拆招、将计就计的历史。

Y：关于长征的发动和准备。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的兵源已经大成问题，在中央苏区政府的极限动员之下，苏区范围内的“扩红”，已经超出了乡村起码的社会生产所要求的底线，老人小孩也被“扩红”。所以，八万多参加长征的部队，其中的五万多人，实际上没有一线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这样一来，激烈的战斗一打，部队就战力大减，逃亡连连。

C：1932年以后，从国军和民团进行兵源补充的管道不再畅通，大的起义也没有了。由于“步步为营”和堡垒战术，俘虏兵的补充几乎断绝。所以，在红军中有军事素质的新兵源就断了，几乎未受训练的农民补充增多。这也是1933年之后，红军素质大为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Y：长征大队里头，二线人员及装备和用具很多，这是后来批评者们比较指责的地方：左右两路作战部队，抬中央纵队一个大轿子，政府大搬家，于野战要求不合，妨碍红军作战。这个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就当时中央苏区领导层的心态和中共关于全国革命战略的想法而言，长征固然是逃生，但首先是一次革命转移。所谓革命转移，就是中央领袖们始终抱着全国胜利，全国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此前的中共革命战略，从来就不是个长程的艰苦过程，而是一触即发，一发而就的暴动形式。就是说，它认为有个紧

致的革命张力笼罩在中国各地，通过某个区域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对苏维埃运动持续大幅扩张下去，一定会触发革命的张力之网，从而点燃全国革命而一举成功。这个革命战略，从一开始起，武装作战就服从于苏维埃运动。我很强调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和在这个结构下的“全国革命战略”对中共苏维埃运动的作用，它几乎是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八七”会议之后，全党一下子就转入到激进状态，并且对全国胜利有着今天看上去无论如何都完全不切实际的狂热和信心。

C：我注意到，国民党也有党军，但从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胜利以后，军事单位及人员的影响就逐渐占了上风，而政治人物除非与军事单位挂钩，否则就逐渐边缘化。但中共在创建中央苏区过程中，军事负责人在决策层级上级别很低，政治人物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优势而几乎垄断决策层。这一点，原先仅仅是从所谓党指挥枪来理解恐怕说服力还不够。因为，在实际上的互动中，毕竟要看手中的实力强弱。究竟红军将领为什么很听话呢？党性强？未必吧。我看原因就在这个全国革命战略上。因为中央红军，中央苏区其快速成长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个全国战略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任何一支红军部队在纯军事意义上是绝无存活下来的可能性的，这一点军事指挥员应当心知肚明。换句话讲，部队及指挥官的生存希望及发展前景完全寄托在中共党组织和其推动的苏维埃运动身上，所以政治组织和政治人员对军事组织和人员就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在这个优势之下，对军队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式教育才行得通，并且又进一步强化这个心理优势。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红军与中共关系和国军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大区别。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反 AB 团和其他根据地肃反时，红军主力部队被政保人员整肃，几乎束手就擒的现象。

Y：这样的情形下，当中共决定长征时，它的全部准备工作着眼点还是换个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再建一块根据地，继续推行苏维埃运动，以期下一次点燃全国革命。

C：就像尝试点燃一个大爆仗，一次没点着，再点一次。不会去想想爆仗或许就根本是一截木头棍子。

Y：那是不可能的，当时他们怎么会有这个先见之明呢？如果有的话，怕是多数人就已经离开了吧。他们没有与此相关的任何知识，说到底，在毛成功之前，所有的革命史都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中共人员也不可能做如是想。他们就是认定，换个地方再干个一年二载，没准就成功了。所以，好不容易建立的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机构和人员架子，是十分宝贵的，是不能放弃的，而且红军还必须对此提供不可动摇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人员和设备，就是部队轻装上阵，那还不是变成了完全绝望的逃亡嘛。有些学者从今天的位置和知识去看当时的情形，指责博古他们“三人团”带政府辎重大队，是没有理由的。

C：理解了全国革命的战略，也就可以理解长征在遵义会议之前，前进路向的几次变化的依据，那就是寻找一个触发全国革命的新根据地。这个战略指导作用到遵义时，就开始变化了。

Y：这先按下不表。从长征准备到开始，红军作战部队状况和它保护苏维埃运动的作战任务，直接导致了“湘江之战”。“湘江之战”，红军折损过半，大部分是那些无战斗力的红军新兵员逃亡造成的。我认为湘江之战强行解决了一个难题，就是长征大队的轻装化，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战斗，任何轻装的建议都在政治上站不住脚。这一仗造成了轻装的事实，而又无须进行任何政治争论，如此恶仗打完，除了牺牲的人，没有任何人受到指责和批评。传说中毛泽东这个时候开始批评中央的指挥，我表示怀疑，即便是毛有这种批评，恐怕他也不会去指责湘江之战的，毕竟从长征开始到湘江之战，不过一个半月。况且，在此之前，长征很顺利。他主要是对五次反围剿及相关的人事安排提出指责。

C：说到军事路线的错误，也就是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到目前为止，分歧还是很大。想来，怎么可能分歧不大呢？前段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张召中不是一直在纳闷儿这个“人民战争”怎么就没见着，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怎么就没有发生嘛。这可是军

事专家啊。当然，可以讲他是因为其他原因才这样说的。我倒以为更可能是这样：他就是这么一个思考模式。张召中这类军事专家，就是在一种所谓的“人民战争”模式下训练出来的，已经成了思维习惯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一说到战争，他的所有想象都变成了“人民战争”神话的延伸了，彼时彼地的具体性对他完全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他对美军装备的细节描述上得到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则完全不能从他的战况分析中得到任何战场知识。同样的，当我们看中央苏区军事失败时，也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游击战的放弃。四、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有一个最应该注意的地方，就是作为红军，它同国军作战的方式，是因为国军的变化而变化的，强敌之下，只有如此。所以，同前三次就不会一样，这是常识。

Y：对。比如讲，这湘江之战，如果一、三军团集中兵力去运动战的话，中央纵队就完蛋了；如果中央纵队也完全运动起来的话，就没有苏维埃了，没有中枢指挥机构了。前三次反围剿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共组织本身就是一支军队，不是一个“国家”政权。按“南征北战”的说法，没有坛坛罐罐，跑就是了。带足一个基本量的粮食弹药，就地解决给养，打土豪，用缴获和俘虏来补充损失，很简单。但当部队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后勤保障就是一个大问题，这法子就不灵了。给养还是就地打土豪，就势必分散兵力，给足补充的时间。如果诱敌深入的话，十几、几十个县的统治区域，搞坚壁清野很难做到。而且，敌人是步步为营，又如何诱敌深入呢？势必要守住一些重要的地域，不能放弃，否则就统治失效，原来的地域统治作废，这就是当时反对的“流寇主义”。

C：所以，关于在湘江之战之后，毛泽东开始从军事上清算“三人团”的说法，我表示怀疑。才过去没几天嘛，仗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该心中有数。国军的那套战法，使红军没有多少空间，这既不是李德的错，也不是将军们无能，情形所迫罢了。湘江之战后，整个队伍有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气氛。这种气氛之下，毛的一系列“风凉话”就开始起作用了。说到底，湘江之战后，三人团没有什么锦囊妙计。那个时候除了革命大义支撑着大家的精神，其实谁都差不多，无计可施。毛也没有什么例外。

Y：但是任何被支撑的精神都要受到现实的挑战，从湘江之战到遵义会议，其间又是一个月。红军几次改变路向，都没有能达成建立新根据地的意图。特别是失去和二、六方面军团会合在湘西建新根据地的希望，使整个红军和中央相当灰心。按前面的比方说法，爆仗是不是截木头还不知道，但点爆仗的火柴没有了那倒是真的。

C：这时候对革命本身有无悲观失望不好说，对革命策略的怀疑怕是无疑的。

Y：总之，一种恐惧开始弥漫于这支空前绝后的坚定队伍里，即：那个所谓的全国革命战略还有希望吗？或者讲，我们这支队伍还有希望去实践这个全国战略吗？这种恐惧感一旦产生，在彼时彼地的凶险环境下，就很难压下去了。中央当时发现这一点时，也试图用以前的政治手段予以压制，总政治部和保卫部当时发了很多指示，也抓了不少人，但没有成效。这种感觉就像传染病。

C：这个恐惧感可能使决断力下降，决策层的自信心是下级所能感觉到的，这很要命。这点我们很有体会的，上级下令时的信心同下级执行的信心是相关联的。

Y：不论你何以名之，反正它开始侵蚀中共长征队伍的肌体了。这也很好理解。如此大的挫折，高级领导人，就那么几十个人吧，互相如何议论呢？如何向中级指挥官解释呢？指挥官们又如何向士兵们解释呢？到黎平会议时，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说是到黔北建根据地，怕是连自己都保不了。所以一到遵义，就改口讲去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期间不过半个月时间，如此，你让中下级干部和士兵怎么想呢？

C：中共到此为止，有两代领导人了。老一代，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出身高低，大都是些老于事故的江湖油子。他们这些人，如陈、李、张国焘、毛泽东，是在成年以后，转入共产党的。在他们成人教育过程中，是做为传统知识分子来培养的，而不是做为共产主

义战士来培养的。他们是在成人之后，才因了各种缘由转入共产党的。他们往往深思熟虑，意志坚定。因为信了边缘化的共产主义，所以往往性格中有着一条道儿走到黑的劲头，也有一种要证明自己伟大给熟知的朋友同学看的那种偏狭。这就使他们对困难能作较有韧性的斗争。第二代领导人，典型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成人教育过程中就是做为共产主义战士来培养的。他们这些人身上少了江湖气，多了书生气，更加由于苏维埃教育体系的特点，使这些人特别的纯真，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冲动而敢于牺牲，但缺少独立思考，不怕困难大，就怕困难长，没有韧性，缺乏耐性。这点，当时从博古身上看很典型。四方面军的陈昌浩也是个典型。

Y：这些人走近了看，你不会喜欢的。他们都太自以为是了，很讨厌。如这个陈昌浩，后来灰头土脑。解放后任职编译局局长，据荣敬本回忆，这个陈局长搞起来运动来，还是热衷得很。我看不是陈昌浩爱整人，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太自以为是了，骨子里头认为自己真理在手。

C：这帮人有群胆，作不了孤胆英雄。特别是，自九月份，因上海局和上海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以后，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这些留学生，向来以国际为靠山，气壮得很，现在同国际联系中断了，他们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Y：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大谈由于国际联系中断而对中共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以外，其他各类回忆录及作品都对此点不提。但是在陕北，1935年底，林育英带国际指示到陕北后，中央去电同张国焘讲，同国际联络上是大胜利。可见这其实是个大事情，只是后来留苏派被压，大家就不便讲当时失去国际联络后人们的沮丧心情了。

C：所以在湘江之战后，他们在精神上就垮了。倒不是被湘江之战的惨烈吓着了，他们不怕这个，而是他们相信的那种全国战略没有指望了，原先苏维埃整套架子全丢了。那样多的战士就哗啦啦地跑掉了。这是一种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会感到的革命孤独感。这个对他们来讲就太可怕了。博古绝望之下，甚至想自杀。

Y：博古年轻，狂热，勇敢。但当湘江之战失败时，尽管红军还有四万人，他却在绝望与孤独之下崩溃了。在这之后，他就当然不算数了。除了给毛帮点用不着的忙之外，他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飞机出事还算成全了他。不像那个李立三，快要胜利了，还跑回来，到处讲“我就是那个立三路线的李立三啊。”让人耻笑。你分中共领导人这样两代，很有事实依据。第二代人，从湘江之战到遵义会议期间，就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第一代。一句话，还是要有“中国功夫”，要有中国底子。否则，你哪来那种自信呢。

C：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开始有市场了吧。

Y：说不上，毛手中又无可售之计，何来市场之说呢？我想强调的是，一定要放弃从事后看的这个观察角度，不能因为毛后来成功了，于是就倒推上去，认为毛一直就是成竹在胸的，似乎他有妙计，只是错误路线不让他讲出来，或者是不让他来干。革命没有这么简单，生活也不是这么个逻辑。我们要从当时的环境和体验去猜测，想象。

C：做到这点是很难的，几乎可以说革命史研究最难的就是做到这一点。因为除了很少的当时的资料外，大多资料都是事后弄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回忆都打上了此时的烙印而失去彼时的合理。因此，我们发展“政治行动分析”这个方法，就是试图找到一种去贴近彼时场景的途径，去建构一个想象的却是合理的场景和场景演变推进的过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说到底不仅是革命史，其他的历史，不也是需要如此地被观察被分析一番吗？如果没有这番功夫的话，那么毛就只能被神化，而其他的领袖就都变成一群屑小了。就如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我们的错误都是由于不听主席的话，我们的成绩都是照主席指示办——那样一来历史就没有了。在革命史研究中，林彪讲话的这种思想模式非常顽强地存活在几乎全部的党史研究和领袖研究工作中。国内如此，海外亦如此，几乎没有例外。

Y: 这期间,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长征前半段, 毛与党中央关系的历史叙述。我们的想法是, 先看看, 毛当时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认为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放弃北进与二、六军团会合, 不仅是毛的想法, 也是其他多数人的想法。放弃北进, 并不是因为有个更加有确实希望的替代计划, 而仅仅是北进路上何健已布好了口袋阵, 没有把握打过去。向黔北发展, 仅仅因为在黎平附近同黔军打了一仗, 看到该军完全没战斗力, 与桂军、湘军没法比, 全都是“双枪兵”。于是向弱的方向发展。这无须诸葛亮式的神机妙算, 只要认账, 只要还想活命, 就可以做到(除非你事先不知道有“口袋阵”, 一头闯进去, 自取灭亡)。再然后, 要看看, 这支红军大队在“湘江之战”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湘江之战”中发生的大规模士兵逃亡, 挑夫大队全散了, 那些体现苏维埃运动成果的辎重丢掉了, 打后卫的主力 34 师建制地给扔在湘江对岸, 过江前后, 士兵逃亡持续不断。在领导层, 博古的自杀企图折射出当时的绝望心情, 等等这一切, 都是现在可以想象到的。所谓兵败如山倒。

C: 诸葛亮也非神机妙算, 那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 总有那么种把凡人神化的强烈意图, 这是题外的话了。说到这支部队的变化, 要结合到他们当初的计划。中央是 34 年 5 月定下战略转移计划的, 目的地是贺龙所在的湘鄂边根据地。他们为此在 8 月份指示肖克、王震率部放弃湘赣根据地, 带上全部苏维埃政府辎重先行出发去湘鄂边, 尽管一路艰辛, 但红六军团很顺利地在一个半月后与贺龙会师。这个小规模的但成功的西征对三人团和中央是有很大的心理支撑作用的。等到黎平会议时, 认识到北上去湘鄂边完全不可能时, 对部队的打击非常沉重。就是说在半年多前仔细筹划并预作准备的全部计划的核心: 去湘鄂边, 破灭了。这怎么得了呢? 成了没头的苍蝇了。再一点, 可能是更重要的, 就是无法再取得国际的指示了。国际是在 5 月份批准了西征的战略计划的。9 月以后, 同国际联络中断。但执行的是国际批准的方案。到了黎平时, 执行原方案不可能了。要改变计划了, 但又无法取得国际的指示, 只能中共自己决策了。李德是最后一个坚持北上去湘鄂边的领导人, 原因就在于他的信心在共产国际身上。其他的留苏学生们虽然没有他那样坚持, 但内心对于改变国际批准的计划是没有底的。但情形所迫, 又只能改变。那种心理空落落的感觉, 使他们的政治强势地位开始崩塌了。

Y: 尽管关于这一段的现场资料很少, 但我们并不难去体会到这些心理、心情的变化。关键在于, 这三个月当中, 具体到长征队伍, 不管是中共还是红军, 其中有个大的主题的变化。就是从革命到“逃亡”的变化。因为, 长征开始的时候, 它依据于中共全国革命的战略, 但经历凶险征战, 这个全国革命战略开始动摇了。这种动摇一经产生, 便一下子就冲垮了你的“革命想象”。毕竟那个全国革命战略是中共组织的核心驱动力。信仰一打破, 你就只有现实问题了。那就是原先长征出来时, 指望以新的革命来挽救这支革命队伍的前途, 现在新的革命不可指望了, 那么这支队伍的命运就只有靠自己了。于是, “革命”就变成了“逃亡”。这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革命心理变化。事实上, 如无此变化, 则毛泽东在后来发展的长期斗争道路就不可能得到全党认同。

C: 你讲的这个“革命”到“逃亡”的转换, 非常之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一下切入到长征队伍的心理层面上, 去感受那时的境况, 从而有可能揣摸到那些人的心思和决定。逃亡并不是说就不革命或是放弃革命了, 它只是这些革命者一时之间没有了革命方案, 没有了具体的革命计划, 革命目标。这个时候, 只剩革命大义了, 你可以有革命口号, 革命言词, 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革命计划。只有这些信仰者内心深处指望着坚持下去, 会有转机, 会有奇迹的。但在行动上, 在具体的作战行军中, 他们已然放下了沉重的革命任务。他们要先把自已保存下来, 直到与国际接上头, 直到有转机出现。而一旦“逃亡”成了全党共识, 则整个红军的行动, 就没有了以往目标约束条件下的刻板, 而变得机灵起来。用现在的语言讲叫反掉教条主义, 本本主义, 实行实事求是的路线。

Y: 不管怎么说,“逃亡”毕竟是一种本能,你压不住它,它就会冒出来。而周围的状况,愈加凶险,则“逃亡”的本能就加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体现着全国战略的政治决策者们,就很难再给这支队伍注入强心剂,他们倒真是无计可施了。

C: 毛也无计可施。

Y: 但毛有个优势,他从容不迫。组织化的精神力量正在衰减之中,个人的精神力量就开始要起作用了。有决定权的就那么几十个人吧。他们周围相互比一比,恐怕就毛至少还是从容不迫,似乎也还有些办法可想。

C: 既然要逃亡了,就没有什么革命大义好讲了。在那些青年布尔什维克眼中,毛的言行举止,他的性格,他的语言风格,是很不合革命范式的,有那么点不革命的味道。其实,你看毛在建国后私下的谈话,与报纸广播里那套东西有很大区别。这些区别放在苏区的时候,就很为革命纯真的标准所不耻,所以,一谈到革命前景、革命战略那套规范言词时,毛就不行了。他本能的反感那些东西,这在苏区时成了他最大的弱项。现在革命标准束之高阁,毛在党内最大的弱项就没有了,相反,就逃亡而言,可能毛身上的那种草根性的机敏与坚毅倒成了党内的独一份。

Y: 我很留意毛在影像中的动作,我发现毛举手投足之间的从容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在长征途中,这个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因为我有这个体会,在上中学时,我们成群结伙外出干坏事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个姓邱的同学参加,这小子办法倒不是很多,但就是从容镇定,越是紧要关头,越是冷静,对团伙很有影响力。有他在,大家终归是可以想出办法过关,不致于散伙。

C: 这种体会相信不少人都有。毛对底层社会比较熟悉,朱德讲“老毛懂那些旁门左道”。在逃亡的时候,这个就起作用了。他一个大活人,走在队伍里,不负担具体的任务,自然话就比较多,从容加上话多,他的影响力就重新建立。有个细节,长征开始时,毛只带了些书籍,却没有随身带地图。因为他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东西在等他,他倒是不慌不忙的在于都河畔待了好几天,东游西晃的。但到湘江之后,毛的心情就变了。

Y: 前面讲过,我们可以去体会毛本人当时的心境。他是着急超过愤怒和埋怨的。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真正的力量反倒是他这个人本身的存在,从容不迫,坚毅沉着。相比较那些已经泄了气的留苏生们,他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了,而且开始深刻地影响他们了。在被人紧追、喘口气都不匀的情况下,他们退缩了,毛也未必是挺身而出。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挺身而出。设身处地想想,他倒更可能宁愿再看看。但这时那帮人退缩了,自然毛就突出出来。况且自长征以来,他的“风凉话”说了不老少。现在情急之下,也就给架在那里了。

C: 这才叫赶鸭子上架,毛不干都不成。在黎平会议上,毛就上架了。关于这一段,有关党内讨论往往是在行军途中,私下谈话,没有记录,只有王稼祥的片段回忆,周在延安时讲这一段也很少。在延安时,出于党内斗争的考虑,毛把心思用在遵义会议的重新表述上,所以,周、博、洛讲遵义会议前这一段的话就很少。我倒是认为这一段很有内容和意味。值得去设身处地地体会。

Y: 一个是周围的战争环境,一天紧似一天,压迫得很。博古他们神经绷得很紧,很多事来不及细想。重压之下,老毛出来顶顶也是个办法,让自己解脱,让党和红军也换换手气吧。另一个,在毛这里,以当时情景而论,是大大严重于他当初上井冈山时的状况。那时,生死考验也有,但不是每一天都有。现在天天都可能是生死之战。他指望什么呢?此时,四方面军还在川陕,想与他们会师还不现实,看看地图和地势,连湘鄂边根据地都去不了,再讲去川陕谁信呢?至少毛不会做如是想。他既要保持对国际的指望,又要去努力尽可能延长红军大队的建制存在的时间,看看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转机。这个转机,在黎平会议半个月后,似乎出现了。那就是刘伯承提出让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转进川西北



，以接应中央红军。

C：注意一个细节，当时张国焘率四方面军正在川陕根据地与川军苦战。元月7日，中央红军占遵义，开始有一小段休息时间，筹备开遵义会议。会议是元月15日召开，大体上在这个时候，刘伯承提出北渡长江，在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新计划。这是自湘江之战后，第一个有进取心的战役计划。作为配合，在这个同时，就发电给张国焘命其主力转入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Y：这份电报从内容上看，还是有很大的一厢情愿。一面让张国焘主力转入川西，一面让他们地方武装守住通南巴根据地，埋下了事后留苏生们指责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的话由。

C：从时间上看，这是毛牵头主事之后，一个重大行动。它的全部含义，就是再搞一次会师，看看有没有可能带来一线生机。

Y：毛只能设定一个个的有限目标，他没有可能也不愿再去相信那些宏大的“赤化XX省”的计划。他打定注意，只要带部队建制逃亡，不被打散，就算成功。至于如何不被打散，他也不知道，他只是相比之下更加顽强地带着部队跑，不停地跑。到了遵义会议上，他已经没有多少事儿要办了。他已经掌握军机大权了，不是他抢来的，是博古三人团主动让出来的。三人团在黎平会议以后，就形同虚设了。刘伯承的新计划在元月15日前已经提出，并且会前已获得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支持。至于那个常委，远不是今天我们以为的那样重要，毛固然需要这个位置，但也未必看得有多重，这是个必备的部件。至于说，后来渲染得很厉害的，所谓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无论如何也是言过其实了。在会议上，以及会议前，三人团早就认账了，在黎平会议前后就认账了。你博古都要自杀了，还有什么嘴硬的。以前的功劳，至此一笔勾销，谁也不会再把他们当回事。所以会议上就没有什么争论。那些后来添加的什么表决了，谁谁投了关键一票啦，根本就是瞎扯。形势在会前就已经明确了。再有说毛在会上总结了经验教训之类的，也站不住脚。

C：在遵义开会时，我想大家讲上几句大话之后，忧虑的还是如何逃亡。在这次会议上，毛绝对不是靠什么“正确路线”或是妙计取胜的，他还是如同当初秋收起义失败之后那段日子里，依靠他与生俱来的那种从容机敏，让这班多少有点垂头丧气而又惶惶不安的中共领袖们寄托了转变命运的希望。

Y：所谓毛放过对“政治路线”的清算，而仅仅批判“军事路线”而取得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这种说法不过是事后加诸其上的“路线斗争”的想象：似乎毛心中已有个包括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全面而正确的方案，只不过是策略地放过政治批军事。这肯定也是经不起追问的。首先政治路线的核心点是全国革命战略——这个东西能批吗？

C：不是能不能批，而是谁也不知道如何批。从何批起呢？你如果讲这套战略不对，应当坚持长期的战斗，在遵义会议前后那样的环境里，你不是成心吓唬人嘛。这么点人还要长期战斗，无法哄住人的，自己都哄不住，所以没有批政治的可能性。

Y：其次，所谓批军事路线又是指什么呢？指军事战略？那它同政治战略是一回事，能批吗？指具体战役指挥？林彪、彭德怀都不吱声，你如何批得。彭德怀反五次围剿中骂了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是佐证“三人团”军事指挥不力的主要证据，彭之骂人时常都有，究竟这句话是如何骂出口的，针对何事，事后又怎么样，都不清楚。如何就能证明一线指挥员反对当时的军事指挥呢？

C：就五次围剿时蒋的战法而言，红军一线将领应当是清楚的，对部队作战能力和具体战役组织究竟有多大空间也应当是清楚的，谈不上战场指挥上有什么系统性的错误。即便是彭德怀骂了李德也说明不了什么。再者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董振堂这些将领也没有什么特别反“三人团”军事指挥的具体表现。况且，林彪还写文章“论短促出击”，显然是赞同三人团之指挥。

Y: 所以, 在军事指挥上, 毛也没有什么支持的力量来证明他比别人更行。在党史叙述上, 一直有个矛盾他们讲不清: 遵义会议之后, “四渡赤水”是毛军事指挥高人一筹的证明, 但同时期又发生了林彪和彭德怀不信任毛的指挥, 要求更换前敌指挥的事情。况且会议刚结束, 毛直接进到一线指挥部指挥的两场战斗全部失利, 这如何解释呢? 几乎所有党史作品在这一段的描述上都有点首尾不接的尴尬。其实, 原本用不着这样来渲染毛的力量。具体的战役指挥, 并不是毛的特长, 虽然与其他政治领导人相比, 在这点上他比别人强得多, 至少是懂得战场上的事情的, 但这不是他真正的力量。他的力量是只有他才有的天生的人格力量, “奇理斯玛”, 就是这个东西才使得毛同一切中共领袖和杰出将领区分开来。事实上, 遵义会议之后, 到5月12日会理会议期间, 红军高级指挥员普遍出现对毛指挥不满的情绪。这其中高潮就是在会理会议上林彪那封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信。

C: 博古这帮人当时并没有试图利用这个事件。我看到的资料, 表明当时政治领导人没有一个因此去指责毛泽东, 相反, 他们全都支持毛。在会理会议上, 毛泽东就可以很顺利地弹压了红军指挥员的不满, 维持住了指挥权威。

Y: 会理会议的记录很不齐全。当时的情景今天想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时, 红军渡过金沙江, 总算是第一次喘口气, 不管怎么样, 还是在毛的亲自指挥下才有这么个结果的。唉, 奇怪的是, 红军指挥员完全不买这一套, 还联起手来要毛靠边站。这很奇怪啊, 要细细说说。

C: 这同后来被戏剧化的“四渡赤水”的具体过程有关。黎平会议中央放弃了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方案, 改入贵州, 主要在黔北一带, 以遵义为中心, 建立根据地。这是政治决定, 红军将领只是执行。入黔一路很顺利, 占遵义之后就开会, 这个会上最重要的决定, 首先不是毛泽东复出, 因为在黎平会议上, 毛已是呼之欲出了。

Y: 对, 湘江之战后, 博古、恩来等人已有崩溃之迹了。他们这帮人扛不住, 毛泽东的意见已起主导作用。保不齐, 通道转兵的时候就如此了。

C: 毛在遵义会议上复出, 只是一个开始, 他除了空的苏维埃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之外并没有其他职权。他的复出应当讲是个过程。在3月4日, 设前敌司令部, 毛任政委, 在3月10日狗坝会议结束时, 张闻天提议设立新“三人团”, 毛泽东才算拥有了红军指挥岗位。所以, 在遵义会议上, 毛的复出已不是最重要的决定, 最重要的决定是又改变了黎平会议上定下的“赤化贵州”在黔北建根据地的方案, 制订了入川, 在川西北, 背靠西康, 面向成都平原, 与四方面军会师, 与二、六军团呼应的新的根据地方案。这是最重要的决定。正是因为这个决定, 遵义会议一结束, 红军即北向长江, 试图渡长江, 从川西南向川西北进发, 由此引起与川军刘湘的二次作战。这两次作战都失利了。此时红军处境十分不妙。原先从黎平杀到遵义, 一路顺利, 黔军没有战斗力。但到黔北之后, 中央军和川军全都围上来, 而川军善战则出乎毛等人所料。所以, 不论是留在黔北, 还是北渡长江都不可能了。于是, 遵义会议之后的那一套振振有词的所谓根据地方案又成泡影。红军顿时又四处逃窜, 打到哪算哪。所谓四渡赤水就是这么来的。

Y: “四渡赤水”并没有一个事先的目标和想法。起先是因了北渡长江去川西北这样的战略构想, 结果给刘湘顶回来之后, 川军和中央军全都围上来, 于是就四处瞎碰。也不能讲毛的指挥有问题, 他也尽力了。碰错了就损兵折将, 掉转头再跑, 碰对了就冲过去, 所以也无所谓用兵如神。但事后看, 毛确实也有如神助, 他就这样乱冲一气, 结果给他冲过去了。这里头, 有个事情我一直有猜测, 但没有证据支持: 就是遵义会议之后, 执行北渡长江进川西南与四方面军会合, 但因为川军能战, 大大出乎红军预料, 随后红军打得很苦, 这期间, 是否毛及政治局对于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师没有信心了? 你看, 川军能战, 红军没有便宜, 只好回过头先在寨令北摆脱追击之敌, 然后, 向滇黔边区跑。发现滇军也不能战, 红军有便宜可占, 红军甚至逼近昆明时, 都未遇到强敌。这肯定影响了毛, 所以毛

在入滇之后的指挥，似乎放弃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想法，他想要在滇省试试运气。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同林、彭发生冲突。林、彭认为必须过金沙江，入川西北。毛当时以滇军好打为由，要攻昆明。一、三军团就怠战对抗毛。

C：就当时情景而言。三、四个月跑下来，损兵折将，损失很大。也正是到了这一段，四万多红军几乎减员一半。这时候，损失的则是“有机构成”而不是累赘了，这与湘江之战是有区别的。带兵的人并没有看到什么前景，政治领导人在会理会议之前，已经好久没有给军队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和构想了。要真的讲，就是逃亡，没有这些政治人物，大概军官们各自都有招吧。所以在会理会议之前，毛泽东也基本上无话可讲，只有“硬着头皮顶住”。军官们自然越跑越丧气。彭德怀后来讲“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即消失了战斗力，非亲自经历是很难体会的”，就是那时的体验吧。特别是从贵阳东侧，绕过贵阳向滇黔边进军途中，林聂、彭杨及董振堂几乎一致地反对新“三人团”的战术布置。而且事实上，也正因为军团领导人的反对，才迫使新“三人团”决定渡金沙江，做出放弃滇东局面的决定。渡金沙江之后，打会理城，又出现“三人团”恋战，而各军团领导人一致反对，要求趁势占据大渡河渡口，以便进川西。这一连串的军事动作，毛都很被动，而军团领导人则理直气壮。毛根本谈不到用兵如神。区别是，在四渡赤水时，他指挥的瞎碰给碰着了。从贵阳绕过来，冲出来了。随后，他的瞎碰又不灵了，而军团领导人的瞎碰又灵了。毛也没采纳军团领导的意见的意思。他很郁闷，但也完全无计可施。他让一、三军团打曲靖沾益，又打会理，这些军团打不下来。毛也无奈，他总不能自己去打吧。只好听从军团领导人的意见，他很恼火。军队领导人反抗政治领导是大逆不道的。早先是有过的，在红四军，毛的反映很激烈。这次又是这样，但不同的是，这次中央是站在毛的一边。当如此挫折之时，军队领导人叫板毛泽东便是叫板党中央，是博古等人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一渡过金沙江毛立即变脸，开始教训红军将领。毛之变脸，是因为过江之后，同四方面军会师前景又出来了，又可以讲川西北根据地了。这就给政治人物壮了胆，又可以恢复党对红军那种战略优势地位。所以会理会议上，那些军头们几个小时就缴了械，不敢再吭声了。

Y：这里渡过金沙江的意义不仅是跳出包围圈，而是同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又出现了。一种传统的政治话语又可以重新出现了，毛适时地选择这个时候反击。在此之前近四个月，他就是顶住不吭声。近四个月的奔波就打仗而言，多数都很不利。但总括起来渡过金沙江，既跳出了老蒋的预设战场，又看到执行遵义会议北上战略的可能性，顺带又把军队干部收拾住，一举三得。

C：军队干部从每场战斗感受上，不认同毛泽东的指挥，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种小局面的战场指挥上，倒不是说毛军事才能不足，而是他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无论如何都有可能出错。如果讲在贵阳城外虚晃一枪，声东击西是神来之笔，那么之后就误判连连，也很正常。问题是毛也很固执，所以同军团领导人之间就在毛本人连连出错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冲突，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因为以前讲长征，从“四渡赤水”之后，就没有了，一下子就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师与张国焘斗争了。这中间有个重要的过渡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给有意识地晃过去了。就是从贵阳东向黔西开始到会理城之战，几乎可以讲错误都是毛的，对的都是彭、林的。这一段你漏掉不讲，会理会议上的事情就解释不清了：怎么好好的，一下子要求更换中央军事指挥呢？原因就在这一段漏掉的历史。加上这一段历史，把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这一段当作一个整体看，你就可以看到，毛不存在用兵如神，谁也没有用兵如神，大家都是无计可施，都不过是在逃亡，拼命逃亡的路上而已。今天你撞对了，明天我撞对了，反正大家一齐撞，终归给他们撞过去了，就是这么回事。至于说到会理会议上，毛翻脸，整治这帮军头，那也是极有必要的。彭德怀自以为撞对一两次就比中央高明，就比毛高明，那也是昏了头，该整。

Y：其实，只有确实存在着战略差异性的环境时，更换领导人才是必要的。从遵义开

始到会理，红军是在逃亡，此时需要的就是机灵、沉着和运气，换人是没有用的。遵义会议换人，那是博古他们意志已处在崩溃状况中，已经干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尽管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有所辩护，但随后，他几乎没有任何留难就交出所有权力，而且一直支持毛的工作，特别是在会理会议上，态度很坚定。

C: 彭、林要换人，也是有分寸的，只是希望毛离开前敌指挥岗位，就是将战场指挥权交出。

Y: 其实，毛倒未必看重这个战场指挥权，他在性格上，没有这个缺点。他可以很放手，以前在中央苏区，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如此，这点比蒋介石强。问题是，在长征路上，这个战场指挥权并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合适。他即便让出来，老彭就行吗？虽说，四渡赤水之后，毛判断有误，但最终每次关头又听从了林、彭的建议，渡过了金沙江。所以，在中央领导层上看，军队干部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况且彭也没有这个胆略来挑这副担子。毛有政治局的支持，又拿准了这班军头们并无胆识来挑这副担子，所以，他就把彭、林痛骂一顿。由此，他不仅保住战场指挥权，更重要的，又重新开始强化对军队干部的统治力。会理会议对毛的重要性有点类似于 1929 年底的古田会议，确定了政治对军队的统治权。这个统治权在遵义会议后有所动摇，在会理会议，毛又扳回来了。他使用的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手腕，至于后来宣传“四渡赤水”，那是延安时期神化毛泽东的需要。而在当时，四渡赤水是怎么回事，军队干部一清二楚的。

C: 只要政治对军事的统治不动摇，战场指挥权倒是可有可无，毛在这之后倒真的少了对具体战役的指挥了。在会理会议之后，新“三人团”就形同解散了。前敌指挥上，彭倒真是在承担更多的任务。总之，在会理会议上，军头们给治住了，毛也是一副“老子还不想干呢”的神情。自然，毛就占了上风。但毛也确实放权了，他也不喜欢这个战场指挥权。

Y: 应当讲，这以后，革命这个主题虽然还在纸面上讲，那也几乎只是给下级干部和战士一个说法了。整个长征就从这里彻底告别革命战略，变成逃亡了。